

20 世纪国内契诃夫小说译介及研究述评

侯 晓 艳

(宜宾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中文系, 四川 宜宾 644007)

摘要:对契诃夫小说的译介始于 20 世纪初期,而对其小说的研究则始于 50 年代。80 年代以来,我国的契诃夫小说研究有了较大的变化和发展,但和国外同期研究水平相比还有很大差距。

关键词:契诃夫;小说;译介;研究

中图分类号:I512.07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315(2000)05-0096-05

安东·巴甫洛维奇·契诃夫是俄国 19 世纪末到 20 世纪初的著名小说家和剧作家。契诃夫弃世已近一个世纪了,但是他的作品,特别是他众多的小说,并没有因为时间的流逝而失去光辉,他的名字也没有因为历史的变迁而被人们遗忘。契诃夫及其小说不仅经受住了时间的检验,成为人类文化宝库中的一笔珍贵财富,而且引起了越来越多人的兴趣。人们不仅阅读它、欣赏它,而且还在此基础上研究它。

作为世界大文豪,契诃夫早就超越了国界而成为全人类的骄傲。正因为如此,对他及其小说的介绍和研究才不仅仅在前苏联是个热门,才不仅仅在前苏联有“契诃夫学”,而且在美国、英国、法国、德国等许多国家也都有大批专门的契诃夫研究者。在我国,契诃夫小说译介和研究早在 20 世纪初就开始了。1907 年吴棣把日文版的契诃夫的《黑衣修士》译成了中文。在译文之前所附的短文中吴棣说:“此篇作者安敦·溪岸霍夫尝喜抉人间之缺点,而描画形容之,以为人间世界,毕竟

不可挽救,不可改良,故以极冷淡之目而观察社会之。”[1]在此,吴棣受俄国民粹派批评家米哈依洛夫斯基的影响,认为契诃夫是一位“冷眼暴露世界丑恶”的作家。

在契诃夫小说的翻译和介绍方面,鲁迅作了大量的工作。1909 年,在他与周作人合作编译的《域外小说集》里,就收了他所翻译的契诃夫的两篇小说,这就是《威施》(《在花园里》)和《塞外》(《在激流中》)。同年,《小说时报》发表了包笑天译的契诃夫的《第六病室》。1916 年,陈家麟与陈大镫合译的契诃夫短篇小说集《风俗述评》上下两册由中华书局出版,其中收有《小公务员之死》、《万卡》、《套中人》等。“五四”以后,契诃夫小说译介的范围有所扩大。1920 年,茅盾翻译发表了《在家里》。1924 年,瞿秋白翻译发表了《好人》。1930 年,赵景深译的八卷本《契诃夫短篇杰作集》由开明书店出版。1934—1935 年间,鲁迅从德文转译了契诃夫早期即契洪特时期的小说八篇,并于 1936 年将这八篇小说辑成《坏孩子和别的奇

收稿日期:2000-05-09

作者简介:侯晓艳(1963—),女,四川宜宾人,宜宾师范高等专科学校中文系讲师。

闻》出版。新中国成立后,契诃夫小说的介绍就更全面了,很多小说都出现了二、三种以上的译本。平明出版社还于1950—1958年间出版了汝龙翻译的《契诃夫短篇小说选集》27卷。此期对契诃夫小说的介绍不再局限于翻译他的作品本身,还陆续翻译出版了苏联一些学者论契诃夫的著作、契诃夫本人关于文学的言论、同时代人对契诃夫的回忆等,这些都为新中国契诃夫及其小说研究提供了丰富的资料。

对于契诃夫的专门性研究,我国是在50年代以后才开始的。但在此之前,已有不少人对契诃夫作过零散却十分中肯精辟的评价,前面提到的吴棹是此列中的第一人。继他之后,瞿秋白在1921—1922年写的《十月革命前的俄罗斯文学》中说:“契诃夫亦是八九十年代的花冠……,那‘契诃夫似的情绪’传染着人,只觉得沉闷、沉闷,要求个结论。”[2](217页)鲁迅对契诃夫也作过极高的评价。郭沫若虽然没有翻译过契诃夫的作品,但他于1944年在重庆《新华日报》上曾发表过一篇题为《契诃夫在东方》的文章,指出契诃夫的作品很适合东方人的感情和兴趣,还特别把鲁迅与契诃夫进行对比,分析了他们两人的相似之处[3]。1954年,巴金等作家专程赴苏参加了苏联为纪念契诃夫逝世50周年举行的纪念活动,中央人民政府对外文化联络事务局和人民文学社也分别出版了《契诃夫逝世五十周年纪念》专刊,《纪念契诃夫》专刊,茅盾、巴金、骆宾基、孙犁等作家也纷纷撰文评价契诃夫,文章多达二三十篇。这就形成了新中国介绍研究契诃夫的第一个高峰。茅盾满怀深情地谈到,虽然他的思想不断发生变化,契诃夫的作品却仍然使他感到兴趣,而且随着时代的不同,他在它们中间常常发觉新的意义。他说,契诃夫善于“从日常生活中间暴露资本主义社会的矛盾,并进而挖出这个制度在普通人的意识领域内扎下的毒根,契诃夫痛切地讽刺了知识分子的利己主义、软弱动摇、孤芳自赏与劣根性。”[5]巴金也写道:“我觉得契诃夫是谈不完的,对于我们,他的作品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宝库,我们必须更好地向他学习。”[5]巴金针对“契诃夫‘不问政治’”的言论,旗帜鲜明地提出了自己的观点:“他的作品中没有一篇不跟政治有关,没有一篇跟当

时的社会生活脱节……高尔基说过:‘庸俗是他的仇敌,他一生都在跟它斗争。’契诃夫攻击庸俗,就是攻击当时的社会制度,也就是攻击整个沙皇的统治。”[6](52页)以上提到的几位新文学运动先驱显然是在对契诃夫创作进行过一定研究的基础上才发表自己的看法的。

从1907年到60年代初,我国的契诃夫研究基本上沿着他是一位“冷眼暴露世界丑恶”的作家这条线索发展下来的,而且多半集中在契诃夫的政治态度、契诃夫对小人物和被压迫者的态度、契诃夫小说的艺术风格这几个方面,而在这些方面作了有益探索的研究者有钱颖川、杨昌、袁英、汝龙、郭家申等。

60年代中期到70年中期,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外国文学在国内不仅没有市场,而且还被视为洪水猛兽,人们避之唯恐不及。契诃夫的小说也难逃厄运,对它的译介无人敢问津,对它的研究几乎是段空白。

随着十年“文革”的结束,契诃夫小说翻译评价及研究工作进入了新的阶段。70年代中期至80年代末这十几年中,契诃夫小说的新译本有:《契诃夫幽默短篇小说选》、《黑衣修士》(中短篇小说集)、《脖子上的安娜》(收小说34篇,其中19篇初次译成中文)、上海译文出版社的《契诃夫文集》12卷等。见解独到的研究论文也频频出现,仅笔者不完全统计,就有六七十篇!这个数字表明,契诃夫小说研究在我国掀起了又一个高潮。例如:徐伟民的《契诃夫小说创作中的儿童形象》[7]、杨毅、施敏的《精巧精炼精确:谈〈凡卡〉的艺术特色》[8]、陈震的《抖动“线团”的魔杖:谈契诃夫小说的结构细节》[9]、惠中的《契诃夫和他的〈套中人〉》[10]、曾恬的《从〈变色龙〉谈重复手法的运用》[11]、郭丽珊的《对光明未来的执著追求:契诃夫人道主义思想发展初探》[12]、金凤的《契诃夫小说的诗意构成》[13]等等。

同时,人民文学出版社、人民大学出版社、湖南教育出版社、南开大学出版社、湖南文艺出版社、江西人民出版社、贵州人民出版社、吉林人民出版社等出版各类外国文学教材中,都有关于契诃夫的专门章节或他的代表作《套中人》的重点分析文章,这些实际上也是关于契诃夫的很好的

研究论文和资料性成果。尤其让人欣慰的是,朱逸森著、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契诃夫研究专著——《短篇小说家契诃夫》于 1984 年问世了,它不仅根据契诃夫的作品,还较多地使用了契诃夫的书信遗产来对他的思想和创作进行研究,这就为契诃夫小说研究开辟了新的领域,提供了新的依据。时隔三年,即 1987 年,徐祖武主编的我国第一本契诃夫研究论文集——《契诃夫研究》与读者见面了。其中收集的契诃夫小说研究论文 11 篇基本上代表了当时我国契诃夫小说研究的水平。

在对这些文章或教材认真阅读之后,我们不难看出,自 70 年代中后期,特别是 80 年代以来,我国的契诃夫小说研究,不论在题目的确定上,还是在材料的运用上,或是研究的方法上,都在原来的基础上有较大的变化和发展。以前的研究,往往停留在对契诃夫小说的译介和对国外有关契诃夫评传资料的译介上;往往是片面的、局部的、不系统的,且多受外国评论家的影响;在方法上,缺乏科学性和独创性,缺乏纵横比较,显得陈旧单一。而 80 年代以来,情况却不一样了,变化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研究范围的扩大。对契诃夫小说的研究,不但有关于创作总体的研究,如杨为珍的《契诃夫和他的小说创作》[14],而且有关于单部作品的论述,如刘凯的《浓缩的艺术:〈变色龙〉初探》[15];不仅注重作家作品本身的纵向分析,如窦淑贤的《论契诃夫及其后期创作》[16],而且注意把作家作品与其他国家的作家作品进行横向比较,如黄颇的《鲁迅与契诃夫小说比较研究》[17];不仅有对艺术特点的一般性概括,如张守仁的《试谈契诃夫小说技巧》[18],而且有对人物形象、语言、结构等的具体探讨,如胡克刚的《别里科夫小议》[19](69—73 页)、杨宗建的《试论契诃夫短篇小说的语言》[19](140—148 页)、王田葵的《契诃夫中篇小说的结构艺术》[20]。范围的扩大,使这一研究走向深入成为可能。

第二,不仅注意从时代特点、历史背景去分析作品,而且重视作家的灵感、想象、个人经历、个性、气质、创作动机、创作情绪对作家和作品的影响,并且多角度、多层次地研究契诃夫创作心理的

波动和变化,从而把对作家作品的社会历史评价和创作心理结合起来。如:王兆年的《时代、人民、追求:鲁迅和契诃夫的时代、生活和创作道路的比较分析》[21]。另外,李辰民也在这方面的研究中作了较好的尝试,他通过评论 A·屠尔科夫的《安·巴·契诃夫和他的时代》,提出了自己对契诃夫研究的历史、现状和发展方向的想法[22],从而标明契诃夫研究已走向深化。

第三,研究方法的科学化和更新,在分析和评价作品、人物时,注意运用一分为二的方法。国内研究者在分析作品时往往注重其思想性,这本是个优点,但过去有些人走极端,采取贴“标签”的简单做法,因而导致了对作家、作品的不公正、不客观的评价。“文革”以后,研究者们已开始力求用历史的、唯物的眼光去考察作家作品了。例如,对契诃夫笔下的“小人物”,很多研究者都不仅看到他们的孤苦与屈辱、怨愤与不幸,而且看到他们性格被社会扭曲后所形成的奴性心理。扈娟的《契诃夫笔下的“小人物”》[19](44—61 页)就是其中的一篇。研究者在研究方法上除了注意科学化外,还十分重视它的更新,他们在运用传统的方法进行研究的同时,也引进了一些新方法,诸如比较研究、影响研究等,从而把契诃夫小说研究带进了一片新的天地。

90 年代后,契诃夫小说的译介和研究更上一层楼。任国桢译的中篇小说《黑僧》是此期出版的契诃夫小说的新译本之一。契诃夫小说的研究者们继续致力于对其作品占主导地位的那种传统的审美意识和表现手法的深入研究并取得了一些新成果,如杨凡周的《契诃夫、沙汀小说中的戏剧因素》[23]和刘功成的《浅论契诃夫小说的戏剧特点》[24]从戏剧的角度探讨了契诃夫小说创作取得成功的原因;吴惠敏的《弱者·觉醒者·行动者:契诃夫小说妇女形象三部曲》[25]和肖支群的《契诃夫笔下的女性世界》[26]专门论及了契诃夫笔下妇女形象的特点以及这些妇女形象与时代和作家本人的联系;李辰民的《契诃夫与医学》[27]、刘翔的《“难以自圆其说”的契诃夫》[28]更是另辟蹊径,探讨了医学对契诃夫的性格和小说创作和影响。更重要的是,契诃夫小说研究者们注意到了他的小说里已露端倪的 20 世纪的现代意识,也注

意到了作为身处世纪之交的契诃夫在思想上和创作上与众不同的特点,不少研究者还对此进行了探讨和研究。这方面的代表人物当推前面提及过的李辰民,他在《契诃夫小说的现代意识》[29]一文中,通过把契诃夫的小说分别与传统的现实主义小说和20世纪的现代派小说相比较,指出契诃夫小说具有三方面的超前意识,并进一步分析了这种超前意识产生的文化背景和历史原因。这就弥补了90年代以前契诃夫小说研究中的缺陷,填补了这个领域中的一项空白,把契诃夫研究又向前推进了一步。当然,由于起步不久,这方面的研究还很不够,和国外同期研究水平相比还存在很大差距,需要作更多的发掘和探索。与此同时,还要克服和避免选题重复,还要加大契诃夫小说译介的步伐。只有尽可能多和尽可能快地把尚未译介的契诃夫小说翻译介绍进来,我国的契诃夫小说研究才谈得上进一步向纵深方向发展。

契诃夫的小说为什么会为我国人民所接受和重视,并引起那么多人的长期研究呢?因为它不仅有很高的审美价值和鉴赏价值,能为我国作家提供丰富的创作经验(鲁迅、叶圣陶、巴金、颖天翼、甚至当代的谌容等著名作家,可以说都从契诃夫的小说中受到启迪),而且可以启示我国的广大读者更好地认识自己所处的社会现实。它之所以在旧中国拥有大量读者,是因为旧中国与契诃夫小说所暴露的专制俄国有很多相似之处。正如鲁迅先生所说的:“我自己,却与其看薄凯契、雨果的

书,宁可看契诃夫、高尔基的书,因为它更新,和我們更接近。”[30](175—176页)“它不是简单地只招人笑。一读自然往往会笑,不过笑后总还剩下些什么,——这就是问题。”[31](106页)这就说明,契诃夫的小说能促使我国读者联系现实、思考问题。从这个角度说,契诃夫小说在旧中国曾起过积极作用。解放后,虽然类似契诃夫生活的社会的基础在我国已经崩溃,然而使契诃夫发笑和愤怒的畸形现象并没有因此完全消失,就象巴金在1954年写的《我们还需要契诃夫》一文中所言:“……固然契诃夫写的是当时俄国社会的面目,可是在他笔下出现的人物也常常在我们中国社会出现……我到处都发现契诃夫所谓的‘霉臭’,到处都看见契诃夫笔下的人物,他们哭着,叹自着,苦笑着,奴隶似地向人乞怜,侥幸地过着苟安的日子,慢慢地跟着他们四周的一切崩溃下去,不想救出自己,更不想求别人。”[32](46—57页)正因为如此,契诃夫及其小说对我们还有着现实意义,我们还需要契诃夫,我们也还有必要对契诃夫小说作更多的译介和研究,让读者从中分辨出是与非,领悟出生活的真谛和人生的意义;让作家们受到更多的启发与帮助,得到源源不断的艺术滋养,从而服务于我们的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

我们相信,随着历史的不断前进,借助译介工作者和研究者们的不懈努力,契诃夫的小说将会以更加完美的姿态展现在我国读者的眼前。

参考文献:

- [1]契诃夫. 黑衣修士[M]. 上海:商务印书馆,1907.
- [2]瞿秋白. 十月革命前的俄罗斯文学[A]. 俄罗斯文学[M]. 上海:创造社出版部,1927.
- [3]郭沫若. 契诃夫在东方[N]. 新华日报,1944-7-15.
- [4]茅盾. 契诃夫的时代意义[J]. 世界文学,1960,(1).
- [5]巴金. 《谈契诃夫》前记[N]. 解放日报,1955-1-29.
- [6]巴金. 纪念契诃夫诞生九十五周年[A]. 谈契诃夫[M]. 上海:平明出版社,1954.
- [7]徐伟民. 契诃夫小说创作中的儿童形象[J]. 吉安师专学报(哲社版),1989,(4).
- [8]杨毅,施敏. 精巧精炼精确:谈《凡卡》的艺术特色[J]. 徐州教育学院学报(哲社版),1988,(4).
- [9]陈震. 抖动“线团”的魔杖:谈契诃夫小说的结构细节[J]. 文学知识(郑州),1987,(4).
- [10]惠中. 契诃夫和他的《套中人》[J]. 文科月刊(上海),1988,(2).
- [11]曾恬. 从《变色龙》谈重复手法的运用[J]. 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科版),1988,(1).
- [12]郭丽珊. 对光明未来的执著追求:契诃夫人道主义思想发展初探[J]. 嘉应师专学报(哲社版),1983,(1).

- [13]金凤.契诃夫小说的诗意构成[J].外国文学研究(武汉),1984,(2).
- [14]杨为珍.契诃夫和他的小说创作[J].临沂师专学报(社科版),1984,(2).
- [15]刘凯.浓缩的艺术:《变色龙》初探[J].河北师院学报(哲社版),1987,(2).
- [16]窦淑贤.论契诃夫及其后期创作[J].松辽学刊(社科版),1984,(3).
- [17]黄颇.鲁迅与契诃夫小说比较研究[J].江西教育学院学报(综合版),1988,(3).
- [18]张守仁.试谈契诃夫小说技巧[J].风流,1985,(1).
- [19]徐祖武.契诃夫研究[C].郑州:河南大学出版社,1987.
- [20]王田葵.契诃夫中篇小说的结构艺术[J].零陵师专学报(哲社版),1985,(2).
- [21]王兆年.时代、人民、追求:鲁迅和契诃夫的时代、生活和创作道路的比较分析[J].河北大学学报(哲社版),1985,(2).
- [22]李辰民.契诃夫研究的深化与方法的更新[J].苏州大学学报(哲社版),1987,(4).
- [23]杨凡周.契诃夫、沙汀小说中的戏剧因素[J].中国比较文学,1997,(4).
- [24]刘功成.浅论契诃夫小说的戏剧特点[J].辽宁师范大学学报(社科版),1997,(5).
- [25]吴惠敏.弱者·觉醒者·行动者:契诃夫小说妇女形象三部曲[J].外国文学研究(武汉),1997,(1).
- [26]肖支群.契诃夫笔下的女性世界[J].俄罗斯文艺,1996,(6).
- [27]李辰民.契诃夫与医学[J].外国文学评论(北京),1999,(2).
- [28]刘翔.“难以自圆其说”的契诃夫[J].浙江大学学报,1997,(1).
- [29]李辰民.契诃夫小说的现代意识[J].外国文学评论,1995,(1).
- [30]鲁迅全集:第六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
- [31]福建师范大学中文系.鲁迅论外国文学[M].北京:外国文学出版社,1982.
- [32]巴金.我们还需要契诃夫[A].谈契诃夫[M].上海:平明出版社,1954.

Review of Translation, Introduction and Study of Chekov's Novels in China in the 20th Century

HOU Xiao-yan

(Chinese Department, Yibin Higher Normal School, Yibin, Sichuan 644007, China)

Abstract: In China, the translation and introduction of Chekov's novels dates from the beginning of the 20th century, while the study of his novels dates from the 1950's. Since the 1980's, great changes and development take place in the study, but there is still level disparity between the study abroad and the study in China.

Key words: Chekov; novel; translation and introduction; study

[责任编辑:张思武]